

试论近现代埃及卧格夫与公共文化的发展

马玉秀*

内容提要 卧格夫源于伊斯兰经训关于施舍和慈善的倡言。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持续性慈善活动，卧格夫是伊斯兰文明史上的一个古老制度，迄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从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伊始，埃及卧格夫旋即产生。埃及的卧格夫主要用于清真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济贫以及节庆开支，公共文化亦是卧格夫关注的领域之一，其重要表征是历史上不断的卧格夫图书捐赠和卧格夫图书馆的捐建。大而言之，阿拉伯世界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前身即为卧格夫图书馆。为保障卧格夫图书馆的良好运营，让其发挥更好的功能，埃及民众又捐赠卧格夫以支持图书馆的运营，这也是卧格夫发挥社会功能的体现。埃及公共文化卧格夫具有悠久的历史，近现代的公共文化卧格夫作为历史的延续，在埃及近现代卧格夫史上璀璨依旧。

关键词 埃及 公共文化 卧格夫 慈善事业

“卧格夫”(Waqf)，其词根源于动词“卧嘎法”(Waqafa)，其复数形式为“奥嘎夫”(Awqaf)，意为“持有、禁闭或禁止”。卧格夫有“宗教公产”“宗教基金”之意，专指保留安拉对人间某些财富的所有权，将其用益权用于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宗教与社会慈善事业。卧格夫是伊斯兰历史上最广泛的持续性慈善形式，旨在建立与维持恒久的慈善事业。其特点是以奉献安拉之名义冻结了产业的所有权，明确限定了用益权。留作卧格夫的房产、田产、基金等归安拉所有，禁止做任何形式的交易。

我国著名伊斯兰研究学者吴云贵先生在其关于伊斯兰教法的专著中，辟出专节对卧格夫做了较为详细地描述，这是我国学者对卧格夫研究所做

* 马玉秀，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的早期尝试,具有开拓意义。^① 卧格夫制度发生在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社会群体中,对卧格夫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状况,而且可以探究穆斯林“乌玛”之间的互助遗风。^② 一些学者对卧格夫持谨慎态度,认为卧格夫在伊斯兰传统时代往往是构成地主阶级政治优势的物质基础之一,进而成为现代极权政治的巨大障碍以及土地改革的重要目标,卧格夫制度的衰落标志着政治经济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提高。^③ 以上研究均对卧格夫做了较为独到的探讨,是关于卧格夫研究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由于现存的卧格夫建筑物众多,史料丰富,卧格夫已成为伊斯兰世界一个颇具生命力的研究领域,涌现出很多著名的研究人员。近代伊斯兰国家的卧格夫制度关乎殖民者的殖民利益,因而卧格夫的研究人员也包括 19 ~ 20 世纪的殖民官员。除了众多的研究人员,由各国的卧格夫基金部、高等院校、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发起的卧格夫国内外会议和学术活动亦连续不断。1997 年 12 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学法学院召开了伊斯兰卧格夫研讨会。2003 ~ 2017 年,科威特卧格夫基金部主办并与世界伊斯兰发展银行及卡塔尔卧格夫基金部等部门联合先后召开了 8 届卧格夫国际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旨在从学理的高度丰富卧格夫理论,以便为进一步挖掘卧格夫的潜力,为完善卧格夫管理提供有效举措。

除举办卧格夫学术会议外,阿拉伯世界的卧格夫研究著作亦非常丰硕。2011 年,沙特阿拉伯学者优素福·艾哈迈德·哈桑对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卧格夫研究著作进行了统计,仅卧格夫研究专著(其中包括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就达 157 部,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 30 余部,诸如穆罕默德·穆瓦法格·艾尔纳欧特的《伊斯兰世界的卧格夫——过去与现在》^④;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萨利哈的《卧格夫及其对促进社会发展的影响》^⑤;阿

① 吴云贵:《真主的法度——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 哈宝玉:《伊斯兰“卧格夫”制度及其当代演变》,《西亚非洲》2008 年第 4 期。

③ 刘志华:《略论埃及伊斯兰教地产瓦克夫的千年嬗变》,《农业考古》2013 年第 3 期。

④ [埃及]穆罕默德·穆瓦法格·艾尔纳欧特:《伊斯兰世界的卧格夫——过去与现在》(阿拉伯文版),贝鲁特溪流出版社,2011。

⑤ [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萨利哈:《卧格夫及其对促进社会发展的影响》(阿拉伯文版),沙特法赫德国王国家图书馆,2001。

腾雅·阿卜杜·哈里姆·萨格爾的《卧格夫经济思想》^①；穆罕默德·本·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的《伊斯兰理念中的卧格夫》^②；穆罕默德·欧拜德·凯比西的《伊斯兰沙里亚法中的卧格夫律例》^③。这些研究涉及卧格夫的属性、教法依据、历史沿革、社会功能、管理改革以及卧格夫在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等，对卧格夫这一伊斯兰社会的古老命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究，既富有学理性，又极具现实意义。卧格夫通常用于清真寺、文化教育、医院、公共设施、济贫以及社会娱乐。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捐赠目标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埃及近现代时期适逢西方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侵蚀，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自然未能独善其身。面对强势的殖民势力，希冀教育兴国、文化护本的埃及社会各阶层，将卧格夫捐赠倚重文化教育领域，从而泽惠埃及公共文化领域。本文对埃及近现代公共文化卧格夫的探讨，能从一个侧面管窥卧格夫对近现代埃及公共文化领域的深刻影响。

一 近现代埃及卧格夫的演进

埃及慈善体制可以追溯到拜占庭或更早时期。在拜占庭时期，埃及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慈善团体（*Piae Causae*），近似于公共卧格夫，还有一种委托遗赠（*Fidi-Commissum*），近似于私人卧格夫。这种慈善体制虽与卧格夫制度称谓不一，却有异曲同工之效。

639~642年，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派军事将领阿慕尔·本·阿斯（585~664）率大军征服埃及，拜占庭总督兼主教居鲁士被迫向阿慕尔签约投降，埃及遂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开始传入，卧格夫旋即产生。

伊斯兰教传入埃及后，埃及先后历经倭马亚王朝（661~750）、阿拔斯

① [埃及] 阿腾雅·阿卜杜·哈里姆·萨格爾：《卧格夫经济思想》（阿拉伯文版），开罗阿拉伯复兴出版社，1998。

② [摩洛哥]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伊斯兰理念中的卧格夫》，摩洛哥卧格夫基金与伊斯兰事务部，1996。

③ [伊拉克] 穆罕默德·欧拜德·凯比西：《伊斯兰沙里亚法中的卧格夫律例》，伊拉克巴格达指导出版社，1977。

王朝 (750 ~ 1258)、阿尤布王朝 (1171 ~ 1250)、马穆鲁克王朝 (1250 ~ 1517) 以及奥斯曼帝国。马穆鲁克王朝被认为是埃及历史上卧格夫的黄金时期,卧格夫的兴盛状况一直持续到穆罕默德·阿里 (1769 ~ 1849) 缔造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埃及的卧格夫能得到长足发展,主要是传统的宗教价值观使然。伊斯兰经训积极鼓励行善,卧格夫的设立大都是为取悦真主和期待后世的回报。许多捐赠者设立卧格夫的声明中首先引证相关的经训,譬如艾哈迈德·帕夏·敏沙维于 1903 年 9 月 22 日呈交西部省宗教法庭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开头就引证了三段经文:“你们绝不能获得全善,直到你们分舍自己所爱的事物。”^①“至于赈济贫民,敬畏真主,且承认至善者,我将使他易于达到最易的结局。”^②“如果你们公开地施舍,这是很好的;如果你们秘密地施济贫民,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③除了上述经文,还引证了两段圣训:“你们为谨防火狱而施舍,即便是施舍半个椰枣。”^④“人死后,他的一切功修中断,唯有三件事与其保持联系:溪水般长流的施舍;益人的知识;经常为其祈祷的廉正子女。”^⑤

虽然卧格夫的产生根植于伊斯兰宗教文化,但其发展亦深深濡染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环境,并非完全超然于世俗社会的神圣存在。就埃及近现代卧格夫而言,埃及近现代的社会背景,即政治、经济和法制状况对卧格夫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全方位巨变对卧格夫乃至卧格夫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伴随政治的变化以及当政者对公共事务的干预程度,埃及卧格夫的社会功能也时强时弱。

综合而言,埃及近现代卧格夫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 卧格夫国有制阶段。在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进行了几次土地制度改革,绝大多数耕地收归国有。到 1815 年底,所有耕地都转变成了政府农场,土地管理彻底被政府掌控。虽然穆罕默德·阿里于 1820 ~ 1821 年、

① 《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 (阿黎仪姆兰) 第 92 节。

② 《古兰经》黑夜 (赖以里) 第 5 ~ 10 节。

③ 《古兰经》黄牛 (巴格勒) 第 27 节。

④ 这段圣训比较有名,《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都有辑录。

⑤ 《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

1844年分别实行了两次耕地再分配，但土地所有权仍未变更。1846年和1854年颁布的条令明确规定，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有受益权。人们怀疑穆罕默德·阿里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借土地改革之名行整顿卧格夫之实。因为根据1812年穆罕默德·阿里下令做出的统计，埃及卧格夫土地在总共250万费丹^①中占据了60万费丹。^②卧格夫所有权归于安拉，具有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的天然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改革之路。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的目的是整顿卧格夫土地，他想阻止卧格夫土地的继续蔓延，因为除了卧格夫土地，他从未干涉其他卧格夫。

2. 卧格夫私有制阶段。这一制度始于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第四位统治者赫迪夫^③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时期。1858年8月5日，赫迪夫赛义德颁布条令，明确承认土地私有制。

3. 社会主义阶段。该阶段始于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时期，无论是房产抑或是耕地，所有制产生了根本性变更。一方面，埃及政府消灭了大型耕地产权，拓宽了小型私有制范围；另一方面，埃及社会出现了掌控国民经济的官方机构，实行产权的国有化，官方机构直接参与卧格夫的社会职能。1952年颁布的第178号法令实施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大力削弱私有制土地。第一阶段私有土地从1952年的200万费丹减至1961年的100万费丹；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又颁布了土地国有化政策；在其后的1962年、1963年、1964年，国有化政策被推向了极致，1969年私有土地减至50万费丹。

土地国有化政策严重制约了私有制的发展，使私有制缩小到最低限度，公有制作为基本国策涉及生产、服务、社会娱乐等领域。1952年颁布的第180号法令取消了私人卧格夫，埃及将全面实现土地国有化视为成功实施土

① 费丹 (Feddan)，埃及面积单位。1费丹=1.038英亩，1英亩=6.07亩。换言之，1费丹=6.3亩。

② Ramadan, Mustafa Muhammad, "dawr al Awqaf fi dam al Azhar," *Proceeding of the symposium of Awqaf Institution*, op. cit., p. 128.

③ 赫迪夫 (Khedive)，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统治者的最高称呼。1867年，英语首次出现 Khedive 一词，源自古波斯语 khvadata—主人。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在伊斯梅尔、阿拔斯一世（1848~1854年在位）及赛义德一世（1854~1863年在位）治下得以用赫迪夫称号辖治埃及和苏丹。

地改革的有效措施。政治、经济、司法的限制，不但制约了卧格夫的发展，也使卧格夫制度本身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大局限了卧格夫的社会功能。

4. 开放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埃及政府又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纳赛尔执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体制，所有制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房产、土地，抑或是其他经济领域，制约私有制的各种条文逐渐被取消。相较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公有制比例锐减。随着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埃及社会又涌现出了一些新式卧格夫。不过相较于埃及历史上卧格夫的盛景，近现代卧格夫的规模已不复往日盛况。

综上，卧格夫的发展除了伊斯兰教的慈善倡议，还与埃及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有着直接关联。总体而言，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末，埃及的卧格夫发展历经起伏。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埃及卧格夫捐赠达到高潮。1946 年颁布的第 48 号法令，成为卧格夫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 1952 年颁布第 180 号法令起，卧格夫开始消退，1952 年纳赛尔革命后彻底退潮。直至 20 世纪末，卧格夫一直处于低谷。

表 1 1940~1958 年埃及卧格夫数量演变

数量 (人)	1940~1946 年	1946~1952 年	1952~1958 年
新式卧格夫总数	2833	892	188
卧格夫年增长数	472	149	31

资料来源：〔埃及〕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66 页。

二 近现代埃及卧格夫的捐赠主体

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土地改革大大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直到 19 世纪末，埃及已全面实行私有制，这为土地卧格夫的捐赠创造了有利条件。至 1952 年纳赛尔革命前，埃及的卧格夫数量剧增，质量也颇高，收益丰硕，成立了“卧格夫捐赠者协会”。捐赠者有达官贵胄，亦有平民百姓，捐赠的卧格夫类型多样，有土地、房产、现金等。捐赠的数量多少不一，少则不足 1 费丹的土地、合伙拥有的一间屋子中所占的份额、几本书，多则大片的

土地和建筑群。卧格夫涉及的地域也非常之广，遍及全国各地。

从社会与经济结构层面看，埃及近现代卧格夫捐赠主体分为五大群体。

（一）统治阶层捐赠的卧格夫

自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执政至20世纪中叶末代皇帝法鲁克国王时期，统治阶层大量参与了卧格夫的捐赠活动。直到1952年的纳赛尔革命，统治阶层的社會地位发生巨变，这一群体的卧格夫捐赠活动趋于停滞。

1.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捐赠的卧格夫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达100多年之久，历任10位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8年在位）、易卜拉欣帕夏（1848年在位）、阿巴斯一世（1848~1854年在位）、赫迪夫赛义德（1854~1863年在位）、赫迪夫伊斯梅尔（1863~1879年在位）、赫迪夫陶菲格（1879~1892年在位）、赫迪夫阿拔斯·希里米二世（1892~1914年在位）、素丹·侯赛因·卡米勒（1914~1917年在位）、福阿德一世（1917~1936年在位）、法鲁克国王（1936~1952年在位）。1900年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王室家族卧格夫的独立机构——王室家族卧格夫署，后更名为皇家卧格夫署。从穆罕默德·阿里至末代国王法鲁克，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参与了皇家卧格夫的事务。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宗亲贵室也参与其中，较为突出的有：穆罕默德·阿里之女宰娜拜·哈尼姆（1825~1882）、阿拔斯一世之母本芭·葛丹、赫迪夫伊斯梅尔之女法蒂玛公主、艾因·哈娅公主、凯马鲁丁·侯赛因亲王、优素福·凯马尔亲王、欧麦尔·图松亲王等。有些亲王因功绩卓著，获得国王或哈里发封赏，遂将受赏的土地捐赠为卧格夫，有些将继承或购置的土地捐赠为卧格夫。

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因成功平叛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获得奥斯曼帝国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封赏的希腊海域萨索斯岛（Thassos Island），穆罕默德·阿里遂将其捐赠为卧格夫。该岛地处地中海，原隶属希腊，总面积约50平方千米。平息瓦哈比运动后，穆罕默德·阿里在麦加和麦地那修建了两处卧格夫客栈，此外还捐赠了四处大型卧格夫，统称为卡瓦拉卧格夫^①，它包

^① 卡瓦拉，穆罕默德·阿里的家乡，今属希腊。1952年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在卡瓦拉和萨索斯岛创设的卧格夫主权归属问题一直是埃及与希腊谈判的主题，至今仍未全面解决。

括：(1) 希腊卡瓦拉卧格夫，穆罕默德·阿里在希腊卡瓦拉市创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在其附近又创建了一所卧格夫《古兰经》背诵中心。(2) 埃及库夫尔·谢赫卧格夫土地，总面积约 10842 费丹 16 基拉特^①。(3) 埃及西部省卧格夫，将两个村庄捐赠为卧格夫，面积分别为 2136 费丹 6 基拉特和 740 费丹 19 基拉特。(4) 希腊卡瓦拉卧格夫，共两处，包括住宅、马厩、花园、树木。埃及西部省两个村庄的卧格夫收益专用于麦加和麦地那两处卧格夫客栈的费用开支，以便人们顺利完成朝觐功修，其余卧格夫收益专用于穆罕默德·阿里在其家乡卡瓦拉创办的学校、《古兰经》背诵中心和图书馆的费用开支。^②

穆罕默德·阿里严格限制卧格夫土地的举措，引起了学者们的抗议。但他对清真寺卧格夫网开一面，不但自己参与清真寺的建设和修缮，还将 1347 费丹的土地作为卧格夫捐赠给清真寺、礼拜点和公墓。穆罕默德·阿里的卧格夫土地主要特点是面积广大，经历代统治者的接续扩充，面积不断扩大。例如，1900 年，埃及统治者在原有卧格夫的基础上又扩充了 1836 费丹 6 基拉特，总收益为 43464 埃镑。至 1950 年，扩充至 7856 费丹 12 基拉特。在王室家族诸多卧格夫土地当中，面积最大、收效最快的要数赫迪夫伊斯梅尔的卧格夫土地。逮至 1895 年去世，赫迪夫伊斯梅尔创设的卧格夫土地高达 49540 费丹，涵盖埃及全境，还有很多牲畜、园圃、灌溉和耕种设施，其中绝大多数为慈善卧格夫（约 36972 费丹），其余是为三位妻子和子女创建的卧格夫（约 12568 费丹）。^③

1952 年纳赛尔革命后，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卧格夫发生了巨变，绝大多数卧格夫被没收充公，有些卧格夫被置换，有些被公开拍卖，成为有史以来寿命最短的家族卧格夫。

2. 达官贵胄的卧格夫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时期，臣僚们也捐赠了不少卧格夫，其中私人卧格夫比重很大。尤其是穆罕默德·阿里、阿拔斯一世、赛义德、伊斯

① 基拉特，为埃及土地丈量单位。1 基拉特为 1 费丹的 1/4，约 175 平方米。

②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 68 页。

③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 145 页。

梅尔执政时期，很多身居要职的高官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捐作卧格夫。例如哈桑帕夏·穆纳赛特热里，他曾担任穆罕默德·阿里的机要秘书、内务部总理兼全埃及司法委员会主席，他将吉萨、盖勒尤卜省和明亚三处的2500费丹土地捐赠为卧格夫。又如艾哈迈德帕夏·米尼克里曾担任苏丹总督至1845年，他将自己在明亚、法尤姆、吉萨、盖勒尤卜省和代盖赫利耶省的2500费丹土地捐赠为卧格夫。

达官贵胄捐赠的卧格夫与王室卧格夫有很多共性，如数额庞大，多为耕地，遍及全国各地。但两者又有区分，达官贵胄的卧格夫多为私人定额的慈善卧格夫，王室卧格夫则为公共慈善卧格夫。例如，曾担任总理大臣的叶哈雅帕夏·易卜拉欣将262费丹4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对卧格夫收益的份额支配做了明确规定：只允许将其中12费丹5基拉特土地的收益用于本家族清真寺的开支、节日庆典等。无论是王室卧格夫，还是达官贵胄的卧格夫，都对卧格夫的累积发挥主要作用，因为这两类卧格夫数量庞大，且成为埃及财富主要来源的土地。

统治阶级捐赠的卧格夫体现了埃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双重现象，即这些精英人士大多曾留学欧洲，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回国后身居要职，为推进埃及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又遵循传统的捐赠行为，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财产捐作卧格夫。他们虽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并未按照西方流行的律法去支配自己的财富，而且西方律法在当时的埃及被视为文明开化的表现。

（二）地主士绅捐赠的卧格夫

19世纪中叶至1952年的纳赛尔革命之前，埃及的地主士绅们大量捐赠卧格夫。由于地主士绅一般与国家机构和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很容易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所以较早出现了捐赠卧格夫土地的行为。到赫迪夫伊斯梅尔执政结束时，地主士绅们通过“馈赠”和“封赏”获得的土地远远多于购置的田地。例如大地主阿加·拜德拉维获封1914费丹的土地，1907年，其孙艾哈迈德·拜德拉维将其中的1392费丹捐作卧格夫。

1882年法国入侵埃及后，大量的产业尤其是国有土地进入了流通领域，其实出售国有土地的现象早在赫迪夫赛义德时期就已有之。1898~1906年，政府迫不得已大量出售土地，以偿还开挖苏伊士运河所借的巨额外债，地

地主绅成为当时的大买家。政府公开出售土地，无论是埃及本国人抑或是外国人均可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地主士绅纷纷将各自购置的土地捐作卧格夫，因为他们都想通过置办卧格夫来巩固自己的财产，同时也不希望埃及的土地以任何形式落入外国人之手。尤其是在赫迪夫伊斯梅尔执政时期，埃及外债危机加剧，地主士绅们纷纷购买国家土地捐作卧格夫，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各自的财产，也是爱国情怀使然。

就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而言，地主士绅捐赠的卧格夫虽然逊色于统治阶级，但其数量毫不逊色于后者。例如穆罕默德帕夏·拜德拉维·阿舒尔捐赠了代盖赫利耶省的好几个村镇，总面积约 1 万费丹。这一群体捐赠的大部分卧格夫形成于 1946 年 48 号卧格夫法令颁布之前。1946 ~ 1952 年，卧格夫的捐赠数量甚微，主要原因是二战后埃及经济疲软、政治失稳、社会问题加剧，随时有可能发生各种政治事件，人心惶惶，自保之心下无暇顾及卧格夫的捐赠。1952 年纳赛尔革命后，由于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卧格夫捐赠行为彻底告终。

地主士绅们虽然政治倾向和宗教思想各异，但其捐赠卧格夫的意愿都很强烈，都大力支持各种新型民间组织。例如名媛胡达·哈尼姆·谢阿拉维从她捐赠的卧格夫收益中规定固定的份额，支持“开罗民间律师公会”，资助那些贫穷的律师。捐赠者除了缙绅，还有大资本家、商人，例如富商哈桑·塔拉兹在 1952 年革命之时将他在艾斯尤特省曼法鲁特郊区面积为 2379 费丹的土地捐作了卧格夫。在爱资哈尔的大谢赫和学者中，他们大多数捐有卧格夫，例如爱资哈尔第 24 任谢赫尹巴比长老 (1824 ~ 1896) 除了将大量的房产和农耕用具捐作卧格夫，还将吉萨和米努夫省的 203 费丹 22 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

(三) 埃及内陆地区居民捐赠的卧格夫

埃及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为卧格夫发展做出了贡献，内陆地区的居民也不例外。由于农业是埃及内陆和沿海地区的主要经济收入，故耕地、农作物、生产工具也成为捐赠卧格夫的主要实体。内陆地区捐赠者的社会身份多元，有农民、职员、商人、手工艺者、退休员工，其中多为穆斯林，亦有极少数基督徒。大多数耕地卧格夫由农民捐赠。捐赠卧格夫的农民有两个群体：拥有 1.5 费丹 ~ 5 费丹土地的农民，被称作“小地主”；拥有 5

费丹~50 费丹土地的农民，被称作“中型地主”。职员、商人、手工艺者捐赠的卧格夫一般都是房产，也有少量耕地。

根据 1951 年的官方统计，截至 1951 年，内陆地区捐赠的卧格夫土地共有 10885 份，其中 9786 份属于“小型卧格夫”（即每份卧格夫低于 5 费丹）和“中型卧格夫”（即每份卧格夫介于 5 费丹~50 费丹），其余的属于“大型卧格夫”（即每份卧格夫高于 50 费丹）。如果一份卧格夫土地按一位捐赠者计算，这意味着截至 1951 年，内陆小型卧格夫和中型卧格夫的捐赠者占 89.9%。亦有官方统计数据 displays，截至 1951 年，内陆的卧格夫土地总面积为 240440 费丹，其中小型卧格夫和中型卧格夫为 69185 费丹，占总面积的 28.8%。总之内陆地区小地主和中型地主捐赠卧格夫土地的比例远超于大地主。^①

保存下来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证明，上埃及大部分城镇最普遍的是房产卧格夫，而且卧格夫的规模差异明显。最小的一份卧格夫是一间小屋，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本·阿里于 1903 年呈交法尤姆宗教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证明，他将紧靠清真寺的一间小屋捐作卧格夫。较大的卧格夫有数间房屋、商铺、写字楼、加工车间等。自 1952 年只允许捐赠公共卧格夫的 180 号法令颁布后，内陆小地主和中型地主捐赠卧格夫的数量骤减，统治阶级和大地主的卧格夫捐赠彻底告终。1952~1996 年，内陆只出现了一份大地主捐赠的卧格夫，即 1964 年，有人捐赠了面积为 53 费丹的土地。然而，小型和中型卧格夫的捐赠一直在持续。截至 1996 年，内陆地区先后捐赠的卧格夫土地共有 85 费丹，房产、商铺等共计 4104 平方米，全部为公共卧格夫，其收益用于清真寺。^②

（四）沿海地区居民捐赠的卧格夫

沿海地区居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与内陆相仿。与上埃及相比，沿海地区的卧格夫主要是土地，捐赠大量土地作为卧格夫的同样是那些小地主和中型地主，而商人、职员、手工艺者捐赠的卧格夫多为房产、商铺、生产工

①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59 页。

② [埃及] 易卜拉欣·班尤米·伽尼姆：《埃及的卧格夫与政治》（阿文版），开罗：曙光出版社，1998，第 63 页。

具。例如,哈吉阿卜杜·瓦哈布·伊瓦德是铜商,1929 年 10 月 20 日呈交迈哈莱宗教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他将自己的一座宅院、两间商铺、一处库房、20 费丹 7 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又如阿里·阿凡提·拜希呈交曼苏莱宗教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他将 1 费丹 20 基拉特的土地捐作卧格夫,给一所教授儿童背诵《古兰经》、写字和数学的学堂。^①

根据官方的《1951 年鉴》记载,沿海地区卧格夫耕地总数达到 7079 份,其中 5684 份为小型和中型卧格夫,占卧格夫总数的 80.29%,其余 1395 份为大型卧格夫。卧格夫总面积达 349487 费丹,中、小型卧格夫总面积为 56096 费丹,占有沿海地区卧格夫土地的 16.05%。

(五) 首都的卧格夫

首都的卧格夫主要以房产和各种生产工具居多。房产主要是住宅、商铺、写字楼、栈房、仓库、马厩、圈棚、咖啡馆、澡堂等。生产工具主要是香皂制造设备、鞣制造设备、渔船修理设备、纺车等。此外,还有遍及亚历山大和开罗等地的道堂。1951~1952 年,卧格夫部对其所辖卧格夫房产的收支做了统计,该年度卧格夫房产收入为 497395 埃镑,开支为 145290 埃镑。对于不在卧格夫部管辖下的卧格夫,无法做出详细的统计。1952 年以来,所有公共卧格夫全归卧格夫部统一管理,并于 1971 年成立了“埃及卧格夫管理署”。根据卧格夫管理署 1994~1995 年度的统计,实体卧格夫总收入高达 12618744 埃镑。^②

开罗和亚历山大相关文献资料显示,这两座城市的一些卧格夫房产是自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时期流传下来的,直至 20 世纪中叶一直在持续增加。1845~1849 年,穆罕默德·阿里政府颁布全面禁止创建卧格夫法令,但没有限制房产、商铺、栈房、磨坊的卧格夫捐赠。1945 年,开罗新创立的卧格夫达 79 处,亚历山大新创立的卧格夫达 27 处。1946 年的 48 号卧格夫法令及 1952 年的 180 号法令颁布后,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卧格夫像其

① [埃及]穆罕默德·艾布·祖赫莱:《卧格夫专题讲座》(阿文版),开罗:阿拉伯思想社,1997,第 98 页。

② [埃及]穆罕默德·艾布·祖赫莱:《卧格夫专题讲座》(阿文版),开罗:阿拉伯思想社,1997,第 98 页。

他地方一样受到严重制约。1951年，开罗新创设的卧格夫只有28处，亚历山大只有4处。1952年，未创设新卧格夫。此后的卧格夫多为存入银行或投入到融资项目中的现金。截至1996年，开罗共创设22份卧格夫，总额为150万埃镑，此外还有18处房产卧格夫。

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捐赠者始终不是固定的某个群体。两地的捐赠者中，财阀居首，其次是富商、手工艺者、职业工作者（工程师、律师、医生），再次是政府职员、退休人员、家庭主妇。各类群体捐赠卧格夫的案例不胜枚举。

(1) 根据卧格夫部亚历山大6号卷宗记载，哈吉艾哈迈德·巴乎希是亚历山大的一位商人，1868年，他将自己在亚历山大和开罗的磨坊、办公楼、住宅和商铺等58处房产捐作卧格夫，其收益专用于教育和社会扶贫。

(2) 根据1929年6月19日呈交亚历山大宗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穆罕默德·本·希俩里（亚历山大的一名厨师）将建有花园的约225平方米的一处宅院捐作了卧格夫。

(3) 根据卧格夫部11059—11070号卷宗，1937年1月28日呈交埃及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身为开罗政府职员的穆罕默德·阿凡提·阿里·赛里姆将自己在开罗艾哈迈尔区的两间铺面的一块地皮捐作了卧格夫。

(4) 根据卧格夫部50号卷宗，1920年4月29日呈交亚历山大宗法院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亚历山大居民赛琪娜·阿里·阿拔斯女士（家庭主妇）将自己在亚历山大宅院的3/4份额捐作了卧格夫。

(5) 根据卧格夫部33629号卷宗，在汗哈利里市场做生意的很多马格里布商人将不少道堂和商铺的收益捐作卧格夫，专用于爱资哈尔清真寺马格里布讲堂的学子。

(6) 根据卧格夫部22581—22591号卷宗，1970年9月22日呈交赫勒万房产登记所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赫勒万退休职员哈桑·塔哈·哈桑将自己在埃及国家银行里的3000埃镑存款捐作了卧格夫。这也是自1952年革命之后注册的第一笔现金卧格夫。

(7) 根据卧格夫部32677号卷宗保存的一份卧格夫捐赠声明书，阿里·伊斯梅尔的遗孀（住在开罗养老院的一位女士）将自己在埃及国家银行里的9000埃镑存款捐作了卧格夫。

上述卧格夫主要用于教育和扶贫领域。这些卧格夫的形成主要基于三

大原因。(1) 捐赠者的慈善举意；(2) 政府撤销对社会服务领域和困难群体的拨款后，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卧格夫的创设是对这一负面影响的回应；(3) 在很多贫困地区，外国慈善协会数量的剧增，刺激了埃及人的慈善意识。这三大原因促使了近现代埃及卧格夫的再次兴起，使之在促进社会保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 近现代埃及卧格夫与公共文化的发展

埃及历史上，为了发展教育，创办卧格夫学校者层出不穷，尤其是达官显贵创办卧格夫学校的现象尤为突出。典型者如：哲鲁鲁丁·舒韦赫·本·斯里姆 (Jamal al-Din Shuwaikh Ibn Sirim) 亲王创办的斯里米亚卧格夫学校；舍姆苏·道莱 (Shams al-Daolah) 创办的迈斯鲁尔卧格夫学校，其遗嘱还将一座小客栈捐作卧格夫，用其收益支付学校的日常开支。

在阿尤布王朝 (1171 ~ 1250) 时期，苏丹卡米里 (1218 ~ 1238 年在位) 于 1225 年在开罗创建了一所“圣训学院”，后称作“卡米里亚学校”，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他将学校旁边的一家宾馆捐作了卧格夫，此外还捐建了几处卧格夫饮水工程。除了创建卧格夫学校，创办卧格夫图书馆和捐赠卧格夫书籍的活动也一直在持续。据伊本·达古里 (Ibn Thagiri) 记载，伊历 628 年 (约公元 1230 年)，著名医生阿卜杜·拉赫曼·本·阿里·本·达赫瓦尔 (Abd al-Rahim bin Ali bin al-Dakhwar) 将住宅和藏书一并捐作了卧格夫，供医生们研究查阅。

在马穆鲁克王朝 (1250 ~ 1517) 时期，一代英主达希尔·拜伯尔斯 (1260 ~ 1277 年在位) 在开罗创办了著名的“达希里亚学校”和“达希里亚图书馆”，学校周边建造了很多商铺，其收益专用于学校的教学开支。除了图书馆，还设有一个藏书阁，专门收藏各个学科的珍贵典籍。学校旁边还开设了一处学堂，专门招收孤儿，达希尔·拜伯尔斯将自己旗下的一家大型客栈捐作卧格夫，专门支付孤儿学校的用度。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期间，卧格夫捐赠活动取得蓬勃发展，所有学校、苏菲道堂、清真寺、市政服务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开支均由卧格夫收益支付。卧格夫在推广公共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各大清真寺为民众开设的公共课就是最突出的例证。很多捐赠者都愿意从卧格夫收益中拿

出若干份额，来支付学者、布道师和教师的薪资，供其在卧格夫捐赠者创办的清真寺或诸如开罗侯赛因清真寺、坦塔艾哈迈迪清真寺里给广大群众讲课。

公共文化领域最突出的是公共图书馆，捐赠图书和公共图书馆亦是卧格夫的文化功能，这一功能在埃及和很多其他伊斯兰国家传承至 20 世纪中叶。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机构，在传播文化、普及知识、维护文献资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亦是为不同阶层民众传播文化的渠道之一。公共图书馆通过卧格夫产生，其中有些是独立图书馆，有些是清真寺、学堂、道堂、客栈的附属图书馆，亦有不少人将私人图书馆捐作卧格夫惠泽大众。

为各大清真寺的开放式讲堂、书店、公共图书馆而捐赠卧格夫，并非只是传播文化知识，亦是在维护一种传统的文化与行为模式，希望能够将这种传统代代传承。正因如此，为清真寺开放式讲堂捐赠卧格夫者对讲堂内容有具体的条件限制。例如 1920 年，优素福·阿凡提·哈赛奈尼在其卧格夫捐赠声明书中声明，每年拿出 12 埃镑支付给在坦塔艾哈迈迪清真寺教学，且利用空暇时间在赛义迪·阿里·麦利基清真寺给群众讲课的学者。同样，公共图书馆捐赠者也对图书馆的卧格夫书籍种类有所限制。

埃及近代史上，在图书馆领域捐赠卧格夫者有爱资哈尔的学者和长老，也有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高级官员，还有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王公贵胄。在公共图书馆领域，最后一位捐赠卧格夫的马穆鲁克统治者是穆罕默德·贝克·艾布·宰海卜。1774 年，他创建了一个大型卧格夫，下设多个公益机构，图书馆便是其一，内有藏书 2000 卷。^①

穆罕默德·阿里掌控埃及实权之前也捐赠了卧格夫公共图书馆。1813 年签发的卧格夫捐赠声明书声称，他在家乡卡瓦拉修建了附属于学校的一所图书馆，藏书均系各学科的扛鼎之作。除了聚礼日、礼拜二和两大节日，图书馆常年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早晨至晡礼时分。遗憾的是无任何资料说明卡瓦拉图书馆究竟藏书多少，所藏何书。

如果说穆罕默德·阿里在卡瓦拉捐赠的卧格夫图书馆是一种文化象征，皇家藏书阁（现埃及书局前身）则是现代埃及在公共文化领域受卧格夫资

① [埃及] 艾布·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肯迪：《埃及总督史》（阿文版），贝鲁特：贝鲁特出版社，1987，第 138 页。

助的大项目。1869 年,奉赫迪夫伊斯梅尔敕令,阿里·穆巴拉克将各清真寺、道堂和破旧学校里的卧格夫书籍收集在一起,建立了皇家藏书阁,馆址定于开罗贾马密兹区。皇家藏书阁后并入全国卧格夫署,由卧格夫署资助并与教育部联合管理。1952 年革命后,皇家藏书阁归文化部管理,更名为埃及书局。

除了埃及书局,受卧格夫捐赠者重视的公共图书馆还有很多。在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公共图书馆中,爱资哈尔图书馆和埃及大学图书馆位居前列。爱资哈尔图书馆,系埃及最古老的卧格夫公共图书馆,由捐赠爱资哈尔各讲堂的诸多图书馆集合而成,经过历代爱资哈尔长老的不懈努力,图书馆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现代意义上的爱资哈尔图书馆创建于 1897 年,至 1943 年卧格夫藏书达 1600 万卷,此后未出现大型的捐赠书籍活动。1931 年,伊斯梅尔贝克·莱姆齐将自己的私人藏书阁连同书架作为卧格夫捐赠给开罗大学(原埃及大学)图书馆,包括一些油画、《古兰经》经文、阿拉伯文和英文杂志,捐赠图书共 678 卷。

埃及书局、爱资哈尔图书馆和埃及大学图书馆规模较大,藏书量较多,故称作公共中心图书馆。还有很多规模不等的卧格夫图书馆,都是卧格夫为传播文化所做的贡献。图书馆本身是卧格夫,为了保障图书馆的正常运行,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界人士又纷纷捐赠卧格夫,以支持图书馆的运行,这也是卧格夫发挥重要社会功能的体现。

结 语

埃及曾属于国祚绵长且疆域辽阔的奥斯曼帝国管辖,其近现代卧格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奥斯曼帝国近代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亦受到埃及近现代社会转型动态以及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影响而有所消长。埃及近现代的公共文化卧格夫是埃及卧格夫在文化教育领域慈善理念的延续,其重要表征为卧格夫图书的捐赠和卧格夫图书馆的捐建。随着埃及开始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卧格夫图书馆进而发展为埃及现代公共图书馆,埃及公共文化卧格夫亦随之进入现代体系。不止埃及如此,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前身大多为卧格夫图书馆,从而完成了各国公共文化卧格夫的现代转型。

卧格夫作为伊斯兰慈善制度的重要内涵，有明确的伊斯兰教经训依据。由于根植于伊斯兰文明体系，埃及公共文化卧格夫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基础，对提振埃及文化教育事业、维护民众的慈善意念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卧格夫将长期存在于埃及社会并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

[责任编辑：张玉友]

alistic nature of Iranian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ranian culture, the taarof culture has also continued and developed this nature. In the long and complex historical evolution, taarof has constantly adapted to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has shown different connotations and forms. This paper has explained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taarof and has analyzed the Zoroastrian and Islamic elements in taarof and has discussed the reform of the Iranian social climate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hree aspects is considered to exemplify the duality of taarof. In terms of cultural nature, taarof is both Persian and Islamic. In term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taarof exhibits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aarof shows adaptability and incompatibility with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Taarof; Zoroastrianism; Islam; Shia

On the Development of Waqf and Public Culture in Modern Egypt

Ma Yuxiu

Abstract: Waqf originated from the Islamic teachings on charity. As a continuous charity in the Islamic world, Waqf is an ancient pro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When Islam entered Egypt, the Egyptian Waqf came into being. The Waqf in Egypt is mainly used for mosque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public facilities, poverty relief and festivals. Public culture is also one of Waqf's areas of concern. Its important characterization is the donation of both Waqf books and Waqf Library. In general, the predecessor of the modern public library in the Arab world is the Waqf Librar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good operation of the Waqf Library and enable it to perform better functions, the Egyptian people also donated Waqf to supports the operation of the library, which i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Waqf's overlapping social functions. The Egyptian public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As a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al Waqf is still shining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Keywords: Egypt; Public Culture; Waqf; Philanthropy

Khamenei's Views of Women and the Evolution of Iran Women's Status

Song Jiangbo, Liu Beibei, Wang Zezhuang

Abstract: As the current supreme leader of Iran, Ayatollah Khamenei's views on women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Iranian conceptions on women, Islamic perspectives on women and Islamic revolutionary views on women. Ayatollah Khamenei values women's family attributes, advocates for gender equalit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and firmly supports gender segregation. He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women'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nd promotes women's self-progress. Ayatollah Khamenei's views on women have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women's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contemporary Iran, and caused many controversies and dissatisfactions at the same time. After all, Khamenei's views on women not on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Iranian women's prospects, but also reflec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ntemporary Iranian leaders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Keywords: Iranian Women; Khamenei; Views on Wom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Systems of Monarchy in Hebrew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s

Zhao Keren

Abstract: The Hebrew civilization an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Egypt civilization belong to the Middle East, both of them belong to kingship politics in political system.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